



三十年前，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深刻影響中國的政策：鼓勵一部分地區、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，讓先富帶動後富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。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，伴隨着經濟社會高速發展，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，但如何實現「共富」願景，卻成為改革步入深水區後最棘手的問題。重慶作為中國西部唯一直轄市，率先承擔改革使命，不僅將縮小基尼系數寫入當地「十二五」規劃，而且還廣邀海內外知名專家學者來渝群策群力，專題討論如何做好「共同富裕」這篇大文章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

共富之路 重慶前行

重慶國資模式 收益用於民生

重慶的國有資產去年已達13,000億元，躍至中國前四。在其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，重慶國資亦在充當政府「第三財政」，每年至少貢獻200億元，用於該市民生建設。更具意義的是，重慶並未出現「國進民退」現象，相反，該市民營經濟仍以每年15%至20%的速度增長，可謂「國民共進」。

年投200億改善民生

在共同富裕研討會上，與會專家對重慶國資發展模式給予高度肯定。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認為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、國有經濟為主導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，很多省市忘了這一點，而重慶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能夠在競爭中實現「共贏」，在全國具有榜樣作用。

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長期進行國資方面研究，他說，重慶國資的經驗可以總結兩點：一是通過國有資產增值後藏富於民；二是重慶用國資收益作為第三財政，直接用於民生。此外，重慶的地票政策含蓄地承認了農民享有土地發展權，這對修正土地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。

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梁柱認為，社會出現兩極分化的原因在於公有制的地位受到挑戰，國資大量流失。他說，中國必須清晰界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，絕不能將社會主義等同於「市場經濟+社會公正」，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。

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亦贊同「能否實現共同富裕與所有制密切相關」觀點，他說，民營經濟往往缺少國有經濟的工會組織、職代會、嚴格的法律法規等，實現共同富裕，就必須在民營經濟上去做文章，不強調其私有性質，要強調其社會主義特色，加強工會的作用，增加和保障職工代表的權利。



重慶在全國率先開建4,000萬平方米公租房。

實現「四大轉移」 兼顧效率公平

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分析道，長期以來，中國難以推進共同富裕主要有四方面原因：一是中國經濟結構發生巨大變化，民營經濟比重大幅上升；二是一些為財富、資本辯護的精英們常常以分配問題複雜為借口，鼓勵百姓忍耐；三是各省市把注意力放在效率優先上，並未兼顧公平；四是國家還未宣佈政策轉向。

政策利基層 重心移農村

劉國光說，重慶實踐實現了「四大戰略轉移」：第一，制定優惠政策，由面向全社會向中低層收入群體轉移，比如建設公租房、推動醫療資源向基層傾斜等；第二，工作重心由廣大城市向廣大農村轉移，促使城鄉協調發展；第三，建設內容由注重經濟建設向注重社會發展轉移，使經濟社會共同發展；第四，農村工作由側重面上號召向深入到戶、到人轉移。同時，重慶工作扭轉了社會「四個傾向」：重慶市採取了建設公租房、調控房地產價格保持較低房價、改革戶籍制度三大措施，扭轉了忽視對農業勞動力吸納和轉移的傾向；通過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等舉措，扭轉了片面追求經濟利益，忽視社會主義本質的傾向；在「兩翼」農戶萬元增收工程中強調戶戶增收，扭轉了注重平均數，忽視平均數掩蓋之下的不均衡的傾向；從「最不發達的地方」發力，根據本地實際，走出了一條貧困山區共同致富的路子，扭轉了重視資金投入，忽視體制機制創新的傾向。



重慶是中國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。



美麗的重慶農村巴渝新居。

以民生促發展 矢志共同富裕

重慶在某種程度上，是中國的縮影——集大城市、大農村、大山區、大庫區及民族地區於一體。重慶全市3,200萬人口，其中農村人口超過2,000萬，大城市與大農村並存；下轄40個區縣，其中14個是「國家級貧困縣」，區域間人均GDP差距最大的幾近10倍。

薄熙來：分好「蛋糕」，才能做大「蛋糕」

重慶沒有選擇「先發展、後分配」的發展路徑，相反，卻在探尋一條「邊快速發展、邊消解差距」的求進新路，一邊做「蛋糕」，一邊分「蛋糕」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指出，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中國應先把「蛋糕」做大，再來合理分配。如果不把「蛋糕」分好，做「蛋糕」的人就沒有積極性，「蛋糕」也就做不大；而只有把「蛋糕」分得公平合理，大家才會齊心協力去奮鬥，「蛋糕」才會做大做好。

2010年6月，重慶市三屆七次全委會提出「民生十條」，明確走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之路，包括推動政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與公平化；要求全市財政支出和幹部精力「兩個50%」用於解決老百姓住房、就業、教育、醫療、養老等民生問題；規劃兩年內投入3,000億元，辦好包括建設4,000萬平方米公租房、關愛160萬留守兒童等在內的「十件民生大事」，讓2,000多萬群眾直接受惠。

薄熙來說，民生不僅是發展的出發點、落腳點，而且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。這幾年重慶用實踐證明：在民生上花的錢越多，政府就會越有錢。2010年重慶經濟發展數據佐證這一觀點：全市財政收入增加49%，GDP達到7,894.24億元，同比增長17.1%，經濟增速居全國第2位，西部第1位。

黃奇帆：搞好民生，亦可促進發展

在共同富裕專題研討會上，重慶市長黃奇帆以富士康來渝落戶為例，再次佐證了「以民生促發展」的科學性。黃奇帆回憶道，富士康搬離深圳後，天津、鄭州、成都、西安等省市主政者都極力爭取富士康能落戶本地。富士康總裁郭台銘認真考察多個省市後，卻決定將企業落戶重慶：一是因為重慶有穩定的勞動力來源；二是因為重慶的公租房建設與戶籍改革能大大減少員工流失。

說到這裡，黃奇帆顯得頗為驕傲：「其實我們建設公租房與推行戶籍制度改革出發點不為招商，是為民生，但民生也可以變成投資環境。」



「熙奇組合」主政的重慶，正積極探索共同富裕之路。

三招破解「城鄉差距」難題

重慶市長黃奇帆在會上透露，重慶作為大農村與大城市集於一體的直轄市，正在通過三方面途徑縮小「城鄉差距」：一是在經濟最薄弱的渝東南、渝東北「兩翼」地帶，實施農戶萬元增收工程，以林改為動力啟動山區的生產力。通過發展林業、林下養殖（畜牧業）和種植業（中藥材等），力爭到2012年，農民人均年收入增加到6,400元，農戶收入戶均增加1萬元；二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，5年內將500萬農民轉為城市戶口；三是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，讓農民的宅基地、耕地、林地產生最大效益。

專家紛讚「大學生村官制度」

中國農業部原常務副部長萬寶瑞聽到這裡，高興地說：「縮小城鄉差距，不能降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，只能通過兩個戰略實現：第一，依靠工

業化和城鎮化，更多更快地轉移農村勞動力；第二，通過發展農村經濟、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，使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速，這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難點和關鍵。」

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認為，衡量地區發展差距是複雜的，因此在理解和應對社會公平問題時也需要採取多視角、多層次的方式和體制。從恩格爾係數、人力資本、人口壽命與HDI指標（人類發展指數）等多方面分析中國的地區差異後，他認為中國的地區差距將不斷趨同，到2020年，中國或能走向共同富裕社會。

提及重慶近年來的改革實踐，與會專家頻頻稱讚。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委員李崇富表示，重慶的探索踐行了歷史唯物主義思想，他特別提到「大學生村官制度」，認為重慶鼓勵剛畢業大學生下基層鍛煉，此舉意義非凡。

社會轉型瓶頸 亟待共富破題

專家建言

與會專家坦言，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，但也付出了三大代價：透支了基本群眾、透支了自然、透支了精神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指出，中國共產黨執政兩大任務分別為：一是發展生產力，做大「蛋糕」；二是把「蛋糕」分好，解決好分配問題。

如今，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，創造了社會主義發展奇跡，但社會矛盾凸顯，各類衝突加劇。王偉光嚴肅地說，中國在未發展時期，只有一個問題，即解決貧困；但發展起來遇到的問題更多、更難，歸於一點，就是分好「蛋糕」的問題。如今，貧富差距已經不可遏制地變大，各地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皆緣於此，共同富裕若不能破題，社會主義就要走上歪路。

提到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現狀，北京大學原副校長梁柱痛心疾首，他指出：社會主義絕不允許出現兩極分化，應該充分認識共同富裕的重要性、緊迫性，正視兩極分化的現實和危害，否則，中國很可能陷入歷史興替的周期律，引發新的革命或國家的分裂。

渝「三進三同」利官民同心

會上更有專家直言中共官員與百姓關係疏遠，導致社會不穩定。專家認為，重慶正推行的「三進三同」（官員進基層、進村子、進農戶，與農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）、「結窮親」、「大下

訪」等政策，極具人情味，能夠有效拉近黨群和幹群關係，也是中國長久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，亦是促進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永葆活力的基礎。



璀璨的重慶主城夜景。